



悼朱自清先生

朱佩弦先生於八月十二日在北平逝世，這是他的朋友
的損失，清華大學的損失，也是中國文學界的損失。

在過去二三十年內，凡是愛好文藝的人，都讀過朱先生的作品，也都受過他的影響。他的文章，清淡，和易，親切，讀後不但感到作者文字的優美，同時也感到作者人格的可愛。因為他的文章，是他的那個可愛的人格表現，所以他的讀者，并不限於某一階層，也不限於某種年齡的人。在廣大的讀者羣中，他是年青或年老，急進或保守，住在這邊或住在那邊，都喜歡讀朱先生的作品。我們因此敢說，朱先生的作品，是不朽的，不但現代的人要看，將來的人，也一定會喜歡讀他，像我們現在喜歡讀漢唐名家的文章一樣。

朱先生一生的精力，全貢獻在清華。他的同事，失掉了這個多年共患難

新鈔問世

萬民矚目的經濟改革方案，居然出現了。記得一年多以前，也有過一個什麼「經濟改革方案」，不過那一回是寫作文章的（北平有幾位經濟學人，會寫那篇文章舉行過密封批判，結果平均分數是十三分），作完了「佈告週知」以後就算了。何況那邊是「行憲」以前的事。「行憲」以後畢竟不同，這一回說了就作，至少是新的「金圓券」（可能有金光，但是並不硬）是發出來了。

在本期的專論欄中，我們載有一篇文章，分析和批評這次的改革方案，在此不再贅述。從我們在文化界服務的人的觀點來看，在過去這幾年來，我們受盡了政府不負責任的膨脹政策的剝削殘害，這一次爲了自己苟延殘喘能繼續在文化界服務，我們真是誠心誠意的，焚香頂禮，禱祝這一次的改革能

的老友，是一個無可彌補的損失。清華的中國文學系，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失掉了聞一多先生，現在又失掉了朱先生，我們希望後起者能繼承他們的遺志，把他們的理想，發揚光大，使其有終久成功的一日。朱先生不但以文章與國人相見，不但以他的學問，領導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學系，還以他那種中庸之道的性格，在清華的評議會及教授會中，影響整個清華的發展。在這萬方多難的今日，辦大學是一種艱難困苦的工作，有許多難於解決的問題，會不斷的發生。朱先生那種沉着、誠懇的言辭，常在意見紛歧的狀態之中，發生一言九鼎的功效。這一個穩定的力量，現在是喪失了。

爲公爲私，我們對於佩弦先生的逝世，都感到無限的悲傷。在本期中我們發出楊振聲及沈從文兩先生追悼的文章，聊表我們對於朱先生的哀思及敬意。（彭）

够成功。

不過，私心是私心，禱祝是禱祝，事實還是事實，「心所爲危，不敢不言」，我們願意在這裏把我們所憂心和懷疑的幾點，扼要提出如下：

（一）在物價果然穩定以後，稅收經過調整，可以增加。但在最初一兩月內，這是來不及的，金圓券的增發率並無法能減至最近法幣的增發率以下。假如在這個初期內，銀錢業系統繼續放款（並且是低利率！），物價如何能穩定？假如在這初起的一兩月期內，物價不能有小康局面，一切計劃豈不是都成空想？政府對於銀錢業，除了增資合併和用紙上條文統制以外，究竟有什麼有效辦法？

（二）檢查倉庫考核囤積，由什麼人去執行？假如過去上海警備司令部

的經濟科長能够作弊（我們很佩服並且慶幸佔據這樣一個位置的人，居然會被檢舉看押），政府有什麼有效辦法制止這類事件不再發生？實際上街入庫檢查的人員們，他們的月薪恐怕比每月四十「金元」（全家一月一共四袋麵，這還是說物價不漲的話）多不了多少。政府是不是相信每人都是聖賢，能够勒緊了腰帶去查抄別人囤積的麵？

（三）手上有三兩塊現大洋或是祖傳下來有一二兩金子的小百姓，他們是否真去兌換「金元」，我們對之並無興趣。結果，真去兌換的恐怕只是這些小百姓。但是政府究竟有什麼方法能使洋商鉅賈軍政大員，真把他們的金

皇赫斯怒·為虎傅翼·借影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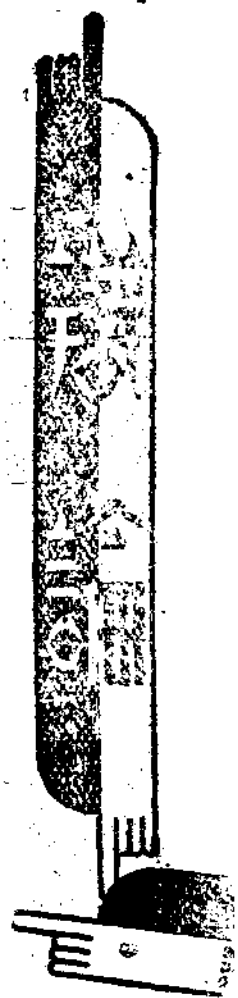
儘管你稱出正統的面孔，說這是「戡亂」，人民心裏都明白，承八年抗戰之後，民力凋敝，國力耗損，接着便打內戰，為的只是要維持一黨，亦就等於一姓的政權，是不可寬恕的。不過普通老百姓不曉得怎樣去說話，怎樣去抒其抑鬱之情。怒火燒在心裏，冤抑壓在心裏。只有受過較多教育因而自承是能用知識的人，才知道如何去說話，為自己抗辯，亦為人民抗議。由於平日浸潤於知識之中，又習於以語言與文字表達其所感所欲，遂得以高於一般人的程度發展其人格，遇到橫逆猝至，受正義感之驅策，有時可以發為咆吼，斥其橫暴，有時可以奮不顧身，批汝逆鱗。有中年青年之分。中年人可望臻於渾到，情與知配合得恰當。青年人往往流於過激，熱情奔放，接近於莽闖。此所以只宜疏導，不可阻遏。防阻之，欲其不趨於所向，適足以增強其其嚮往之忱。清末知識青年趨嚮於革命黨，北洋時代趨嚮於國民黨，何嘗不受誅戮？誅戮一次，革命勢力增漲一次。到了今日，當權者太儻敗，太自私，知識青年要革他們的命，這本是時代進步下應有的現象，不一定有很多人已參加了共產黨。若必欲誣指為「共黨間諜」，為「職業學生」，意思是欲打擊他們，實際却是在那裏「捧」好漢，為共產黨蓋義務造就了一批幹部的「原材」。若肯這樣想，小不忍，在「皇赫斯怒」中，不甘心，必要

條美鈔外匯資產賣給政府或是存在中央銀行呢？政府說它並不是沒收，而是徵購或封存，所以大戶持有者人並不吃虧，應當會毫不遲疑的呈繳出來。關於這點，我們覺得政府未免過於簡單，認為這些大戶必然是「人之大，性本善」。我們希望政府將來不會失望，並且把會任和現任政府特任以上的大員們所申報和兌換的黃金，美鈔，外匯資產的數目公佈出來。假如他們真繳了數，我們本既往不咎的精神，一定不根究這些資產的來源，而反予以旌表贊揚。（汝）

咬青年一口，不亦可以已乎？

最近又演出了一齣「咬青年一口」的亦文亦武的戲文。據說在全國各地一齊演，但似乎因為北平是「戲劇」的中心，所以特別着重於在北平之演出。北平原有一隻不受「土地老爺」節制的虎，在七月五日那天出現過一次，噬死噬傷了許多人後，哈囉了將近五十天，尙無下文。忽然天眼開，奇文突出，索性給他傅上翅膀，叫他去作飛撲的姿態，以示威迫，另在「法律」後身樹上一個倒影，讓「嚇壞了的」小夥子對它跪膝叩頭。這一副翅膀不是別的，便是奉命推諉的行政院在八月十七日頒布的所謂清除間諜安定後方應行注意事項。這道命令本身的矛盾百出，不必去論它，交給老虎傅在身上，便「殺氣騰騰」起來了。偏偏這些小夥子不識好歹，還在說什麼「畏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義不可對。」

看戲的人看着這齣亦文亦武的戲，是喝采，還是嫌惡？「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對這事，我們雖不欲多批評，對這問題，我們亦不欲多推諉。我們只願提出這樣的一個疑問，請讀者自作回答：以結合青年上場的一個政權是否便這樣以摧殘青年下場？（振）



社會主義的經濟是否需要計劃

- (一) 社會主義的經濟需要計劃..... 負 生
- (二) 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需計劃..... 春 生
- (三) 答春生..... 負 生
- (四) 答負生..... 春 生

(一) 社會主義的經濟需要計劃

我有一個籠統的想法：我總覺得所謂社會主義必然含有計劃經濟的意義。若說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需計劃，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有這種模糊想法的，恐怕不祇我一個人。但是，既要辯論這問題，我就必須把我這「籠統」「模糊」的想法，給描繪確切、清楚了。

以下我想說明：(一) 社會主義的經濟倘有計劃會有些什麼好處？(二) 假如說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需計劃是否可能？

我認爲：社會主義具有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必取消私有財產制度；另一個是必須實行計劃經濟。以此二者爲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條件，我有如下的推論。

(一) 倘使社會主義的經濟而有計劃(我們要注意：這裏所謂計劃，乃是指 planned economy 不是指 economic planning) 則會產生許多的好處：這好處可由兩方面來說。

一、在生產方面：可以避免馬克斯所指出的「社會生產之無政府的状态」。在那種狀態中，包括着：缺乏有意識的社會經濟上的分工；供求不能澈底地「相謀」因而造成的供求失調現象；經濟恐慌；及因經濟恐慌而引起的失業、社會騷動等現象。

二、在分配方面：在社會主義的經濟之下，分配也是社會化的，有計劃的；不是私人的，無計劃的。這樣，一則可以避免私有財產制度下的貧富不均現象；再則可以實現真正的計劃生產。何以呢？因爲真正的計劃生產，必

需以「用途」的廣狹、急緩，來決定生產次序上的先後。這所謂「用途」，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之下，當然是指大眾的用途，不是少數特權階級的用途。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產項目及數量是以利潤多寡或市場的銷路來決定的。如果我們說資本主義的生產，也受「用途」的決定，那麼它便是受少數有能力購買的人們的「用途」所決定。但這與上述以「大眾用途」來決定的社會主義生產，是大不相同了。

(二) 以上是專就正面來說，指明有計劃的好處。以下再說明：如果社會主義的經濟沒有計劃，是不可想象的。

一、假定生產事業是私有的，這不可能。因爲所謂社會主義根本就是產業公有公營。生產事業私有而無「計劃」，這正是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

二、假定生產事業是公有公營的而無「計劃」，這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按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公有公營本有兩種意義：一個是取消私產。達到這一點祇要把生產公有公營即可，也許可以不必牽涉到「計劃」的問題。

但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公有公營還有另外一個意義：即要取消貧富不均現象，這就非常要公道的平均的分配不可。而這種分配方法當然與生產息息相關。如果生產毫無計劃，欲求有效的公道平均的分配，如何可能？

三、除上述因社會主義經濟的公有公營而證明需要計劃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即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是以提高全民生活水準爲目標的。爲了

達到這個目標，在生產方面，非有全盤的計劃方可。有這種照顧到全局的計劃，至少能提高生產的效率。如果沒有這種計劃，可能又造成了嚴重的供求

(二) 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需計劃

社會主義的定義很多，其中有一點是很多人可以承認的，就是社會主義之下，生產工具，必需公有。這一點，是資本主義，或其他主義，與社會主義不相同的地方。至于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并無必然的連繫性。在社會主義之下，可以不必有計劃經濟，而在其他主義之下，也可以有計劃經濟。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但立國之後十一年，才實行計劃經濟。法西斯的國家，是以實行計劃經濟出名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美國，在大戰期內，也實行計劃經濟。所以海耶克(H. A. von Hayek)曾說過：我們可以有很少的計劃，與很多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很多的計劃，與很少的社會主義。由此可見這兩個範疇，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是不必拉在一起的。

我是反對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連在一起的；我主張要社會主義，但是不要計劃經濟，其理由有五：

第一，計劃經濟，妨害了消費者選擇的自由。在計劃經濟之下，一個國家的生產設備，應當生產一些什麼東西，不是由消費者通過價格機構而決定的，乃是決定于設計機關的少數人之手。少數人的決定，必然是武斷的，因為現在的社會科學，還沒有產生一種方法，可以讓人在事先正確的預測消費者對於某項物品需要的數量。所以計劃經濟，必然是以少數人的判斷，來代替全民的判斷。這種生產的方法，可以產生兩種結果，其一為計口配給制，即是由設計機關生產某一些物資，而將這些物資，根據某種標準，分配給消費者。消費者假如是喜歡吃猪肉的，而分配到手的乃是羊肉，他也只好忍受。另一結果，就是由設計機關生產若干物品，而讓消費者在這些物品之中，可以有某項程度的選擇。譬如設計機關對於肉類，可以決定供給四種：即猪肉，羊肉，牛肉，雞肉。在此範圍之內，消費者可以任擇其一，但消費者不能選擇魚肉，因為此項物資，根本不在生產計劃之內。有許多人，以為計劃經濟，辦到了後一種結果，即已顧到了消費者選擇的自由，實為一大錯誤。消費者選擇的自由，只有在他的選擇，可以影響到生產因素的分配時，才算完全實現。假如生產因素的配合，早已由設計機關決定了，消費者只能在由于這種生產因素的配合而生產出來的物品之中，有所選擇，還不算保有選擇的自由。

第二，計劃經濟，妨害了人民就業的自由。計劃經濟，既然要規定每項物資生產的數量，因此同時也就規定生產某項物資的人數。譬如在某項計

失調等等現象，則公有公營的意義，也喪失殆盡了。

春 生

劃之下，規定在一年之內，要生產烟煤一億噸。這一億噸烟煤的生產，在某種生產技術之下，假定需要四十萬人。這四十萬人的募集，大約只有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就是強迫徵工。為要實現一億噸的生產計劃，既非有四十萬人不可，那麼設計機關，可能採取最簡便的方法，武斷的分配四十萬人給生產烟煤的機構。這就妨害了人民就業的自由，因為這四十萬人中，也許有很多的人，是不願意當礦工的。另外一個辦法，便是將礦工的工資，不斷提高，到招足了四十萬人而後止。採取後一個辦法，雖然沒有妨害人民就業的自由，但是違反了另外一個經濟原則，便是生產因素的合理分配。

我們反對計劃經濟的第三個原因，就是因為他無法達到生產因素的合理分配。生產因素的合理分配，是任何社會中最重要問題。一個國家中人民生活程度是否能夠提高，就要看生產因素分配是否合理而定。假如某項生產因素，用在甲種企業中，可以產生一百元的價值，而在乙種企業中，只能產生八十元的價值，那麼他就應當放在甲種企業中。最合理的生產因素分配，假如我們用經濟學的一種術語來講，就是要使每一種生產因素的所得，等于他的邊際產品的價值。這一種境界，只有在完全競爭的情形之下才可實現。在計劃經濟之下，對於任何生產因素(資本，勞力，或土地)的利用，因為係武斷的，所以不能恰好處。他對於生產因素的利用，可能發生兩種結果，一為利用不足，如某項企業中應用勞工二十人，他却只用了十五人；一為浪費，如某項企業中只能用勞工二十五人，他却用了三十人。利用不足與浪費，對於人民的生活程度，都有不良的影響。

第四，計劃經濟，必然會產生計劃的浪費。在計劃經濟之下，必然在中央要有一設計機構，在各省市，各生產單位中，要有分機構。這些機構之中，要僱用許多統計員，會計員，抄寫員，製表員，查圖員，工程師，技術員，經濟學者。這些人的數目，合起來是可觀的。計劃製定之後，各生產機構，是否照此實行，非時加考核不可，因此另外還需一套考核的機構，并且在各省市，各生產單位中，要有考核員，監視員，督察員。這些人的數目，合起來也是可觀的。假如沒有這一些人的存在，生產工作依舊可以進行，那麼國家僱用這一些人，完全是一種浪費，對於人民，一種不必要的負擔，正如承平時時代，軍隊對於人民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一樣。

最後，計劃經濟，必然產生經濟權的集中，因而容易為野心家所利用。

許多人以為計劃經濟，起源于蘇聯，其實，埃及第一個造金字塔的皇帝，就是實行計劃經濟的。他把握着國家裏的人力與物力，而把他們用在建築金字塔，上面。假如埃及的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決不敢把生產的原素，照着國王的心地去安排。我們現在是二十世紀，當然不會再出一個造金字塔的野心家，但是也不敢保險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不出一個拿破崙或希特勒。他可以鞏固城防為名，或以保衛某種主義為名，把一國的資源，用在窮兵黷武方面。這種不幸的可能，是任何社會所不能不預防的。

由于以上的看法，我主張在社會主義之下，仍然維持價格機構，用價格機構來決定生產數量及生產原素的分配，而不假手於任何中央設計機構。在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也就是私有生產工具，轉變為公有生產工具的過程中，大的生產單位，依舊維持公司的形式。公司的董事會，在資本主義之下，是由股東選出，對股東負責的。但在社會主義之下，我們無妨採取法國國營事業的經驗，此種董事會由三方面共同產生：即政府，生產者及消費者。董事會選派經理，其用人權不受政府的干涉。公司的生產方針，不以謀利為目的，而依照政府所指示的下列原則進行。

第一，一切生產成本，須減至最低的限度。

第二，生產的數量，要到邊際成本，等于價格為止。

第三，對於生產因素所付的代價，須使其等于邊際產品的價值。

以上這三條原則做到了，生產因素，便得到了最合理的利用；產品的數量，也就是最適宜的，人民的生活，在固定的情形之下，也就達到了最高的水準。

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我上面所列的原則，就是完全競爭下的生產原則，只有在價格機構存在之下才可以運用。因此，我主張在社會主義之下，要保存價格機構，要讓一切生產事業，參酌價格機構的實際情形，遵照上列的生產原則，去進行生產的工作。

答 春 生 負 生

拜讀了春生先生這篇「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需計劃」之後，十分佩服他推理的周密。我對經濟學本來是門外漢，不過既然站在「社會主義的經濟需要計劃」的立場講話，便不能不舉出一些自己立場辯護的理由。在未得到春生先生再對我所舉的理由駁覆以前，我仍然相信社會主義的經濟需要計

劃。

在舉出我對春生先生文中所列各點答覆以前，我願意先申明一句：我覺得春生先生的立腳點根本和我的不同。我所注意的是分配問題，我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之所以需要計劃，第一便是為了使人們的生活必需品有普遍性的分配，其次纔是為了解決所謂選擇，或較好的享受問題。但春生先生似乎仍然有意無意地假定了一個私產制度的社會（雖然他在文首曾先聲明：他同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工具，必需公有）。這一點是我們基本的差異。以下逐次答覆春生先生文中所述各點。

（一）春生先生說：計劃經濟妨害了消費者選擇的自由。關於這點，我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我要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謂「消費者有選擇的自由」，其中之「消費者」是那些人？有多少人？假定全社會有一百個人，也許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真正」在實際上能享受此種自由的，祇有二十個人。其餘的恐怕都是「力」（購買能力）不從心，所以他們實質上等於沒有這種自由。不但不能自由選擇吃豬肉抑吃羊肉，他們根本就吃不到任何肉！如果不以去題太遠見實的話，我還要補充一句說：他們連吃飯都吃不飽，何況「選擇」吃肉？

第二，拋開反問不管。須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未嘗不可以使消費者，有所選擇。例如蘇聯今日對於勞動者，便採取所謂貨幣支付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勞動者得到了貨幣，當然可以購買他願意買的東西。這何得謂之曰：無選擇的自由？

照我的拙見：惟其有「計劃」，所以纔能調查需要的種類、數量，而相應地生產。惟其無「計劃」，所以纔發生：生產和需要不調協，以致有需要的東西沒有生產，生產的東西沒有需要的現象。

也許在計劃經濟的初期，為了「先」普遍地滿足大眾的基本需要，使各得溫飽；可能不能生產奢侈品或可供「選擇」的物品的現象。但這正是社會主義的精髓所在。這不但不是春生先生所說：「司設計的「少數人的決定」；相反地，這乃是社會全體大眾的普遍的需要。

（二）春生先生說：計劃經濟妨害了人民就業的自由。關於這一項，我也有兩點可說。第一，試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就業得到了什麼程度

的自由？恐怕因為生活問題的逼迫，大家還不是有事就做，管什麼「興趣」不興趣，談什麼選擇自由！因為自由的選擇至少要有兩個 *Alternatives*。如果一個 *Alternative* 是你沒有興趣的工作；另一個是沒有工作（即失業——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產品），你當然「選擇」第一個。但是這個「選擇」够得上十足意義的選擇麼？它的本質不正是「被迫」麼？在生產自由競爭，出賣勞力自由競爭的制度下，人「們」能有真正意義的就業自由麼？我請問春生先生以及其他所有主張自由經濟的學者？

第二，反之，在實施計劃經濟的蘇聯，倒可以有這種自由。蘇聯的所謂計劃經濟乃是先由中央決定原則，然後把它發佈到各地方或各生產部門中去，在決定一種生產的詳細計劃之前，工人們都來參加。在這種情形下，工人反而可以對於所要參加的工作，有所抉擇了。春生先生所擔心的：設計機構武斷地分配工人就業的事實，就不會發生，或至少是容易避免的了。但在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如第一項所述，即使有表面上的所謂就業的自由，在本質上（亦如第一項所分析者）却正是就業的不自由。

（三）春生先生又說：計劃經濟無法達到生產因素的合理分配。我奇怪：何以在我看來是在計劃經濟下恰好可以辦得到的事情，春生先生偏偏說辦不到，而是在自由經濟下能辦到的。生產因素合理分配的重要性，誠如春生先生所說。但是我不能解：「在計劃經濟之下，對於任何生產因素（資本，勞力，或土地）的利用，因為係武斷的，所以不能恰好處」。我不明白：何以「計劃的」便必然等於「武斷的」？也許春生先生可以說：「因為計劃的是少數人的計劃」！若果如此，那麼我們就不能不認為代議制也是「武斷的」了。何以呢？因為以議員的人數和全體選民比較，則議員也是「少數的」！

我覺得：根據在決定計劃之前，大家都參加意見或批評一點言，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此種「計劃的」便是「少數人的」；亦猶之不應承認代議機構的來源是少數人的一樣。但在制定細目詳情的階段，便似乎必然地由比較專門的人才來做，根據此觀點言，計劃也可以說是少數人的。可是，這個所謂「少數的」亦猶之議會是少數人一樣。

另有附加解釋者：不但「少數人的」可以不是「武斷的」，即「一個人的」也不必然是「武斷的」。例如君主固為一人，但他既可以實踐着「君主制」，也可以實踐着「暴君制」。在後一例中，他是武斷的；因為他以自己的意志代替全民的意志。在前一例中，他不是武斷的；因為他以全民的意志

為意志。可見即使是少數人的，一個人的，也不必就是武斷的。

「計劃的」既不必是「武斷的」，則「不武斷的」計劃，就不會使生產因素發生分配不合理的現象。春生先生所舉「利用不足」及「浪費」兩種現象，在我還不懂經濟學的人看來，正是自由經濟的毛病，而春生先生却說它們都是計劃經濟的毛病。試問既有「計劃」，何以會產生春生先生所舉的「如某項企業中應用勞工二十人，他却只用了十五人；……某項企業中只應用勞工二十五人，他却用了三十人」的現象呢？這「計劃」能會糊塗到這種地步麼？再退一步說：即使「計劃」可能如此糊塗，但這只是計劃不精，並不能證明：「不需計劃」。總之，無論如何，我總認為：承認在散漫而無人為的控制的自由經濟制度下，容易、更難，有春生先生上述的現象；而在計劃經濟之下，不容易、甚至不可能，有上述的現象。

（四）春生先生第四點是說：計劃經濟必然會產生計劃的浪費。我讀到春生先生文章這一節，想到一個比喻。我以為如果認為計劃的工夫和勞力是浪費，那就像說：一個夜行崎嶇路途的人用他的腦力來考慮前面的一步是否有一個懸崖，俾決定止步與否，是腦力的浪費一樣。如果春生先生認為這也是浪費，那麼，我也承認計劃經濟的「計劃」是「浪費」。不過，仔細想來，還能講得通麼？

其次，計劃經濟不見得是必需有許多「計劃專家」，相反地，乃是各種生產部門，甚至於工人，都要參加的工作。即使有春生先生所說之：統計員，會計員，抄寫員，製表員，畫圖員，工程師，技術員，等等，我恐怕這些無一不是在自由經濟下私人生產機構中所有的。若然，則這足以證明他們是任何經濟制度下所必需的，而不是浪費的。如果春生先生認為僱用這些人們的擔負，在計劃經濟下，「對於人民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難道在自由經濟下，由資本家把這些消耗轉加入商品的成本中，因而也轉嫁於「人民」的擔負上去，就是「必要」的了麼？

再次，如果真談所謂「浪費」，那麼，在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下的週期的恐慌，就整個社會觀點說，纔是最大的浪費。有人說：美國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比美國打一個最大的敗仗損失還大！未知春生先生對此如何解釋？

（五）春生先生尚有第五點：計劃經濟必然產生經濟權的集中，因而容易為野心家所利用。我認為：若談經濟權力的集中，那麼現在獨佔的資本主義時代，經濟權是真正够集中的了。我們試一看資本主義國家的大

control and trust 即知。而獨佔的階段乃是自由經濟必走的階段，所以自由經濟也絕對不能避免經濟權的集中。惟其是在私人手裏，而且又集中，所以這種權力能和服務 (service) 當然是社會性的服務) 脫了節。英國唐納 (R.H. Tawney) 所大聲疾呼要剷除的，就正是這種 (他所謂：) 「經濟的寡頭現象」 (economic oligarchy)。相反地，在計劃經濟的制度下，因為計劃並不是一兩個人，或少數人的，所以其「計劃」的內容、目的都會是為全民福利着想的。因此，祇若真是我們上述所謂「計劃」(如果不是，那自然又當別論)，則不會有春生先生所擔心發生的現象。我覺得在真正十足完滿意義的計劃經濟之下，經濟權力不能謂之為「集中」；因為大家都參加決定這計劃了。即使叫做「集中」，此種權力也較自由的私人經濟下集中的經濟權力，不易被濫用 (abuse)；因為大家都參加運用這計劃了。

春生先生最後一節，即「由於以上的看法：」一節，其中所說，仔細分析起來，似乎又含有「計劃」的味道了；不過其計劃和我所謂計劃，也許稍微不同，但距離他所贊成的「自由經濟」也許更遠一些了罷？

一九四八，八，十七，於看雲樓。

答 春 生

負生先生認為社會主義有兩個基本條件，一為取消私有財產制度，一為實行計劃經濟。本來社會主義的定義是不同的，春生先生自然可以有他的定義。但我願指出，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至少有一百年的歷史，而計劃經濟的提倡，及其理論的闡揚，乃是蘇聯立國以後的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對於取消私有財產制度一點，可以說是大體同意的，但對於計劃經濟，則很少有人談起。即以馬克斯的「資本論」而說，在那二千餘頁的鉅著裏，只有很少幾處，談到生產要遵照計劃，但言而不詳，不知其命意何在。現在，各國信奉社會主義的人，有許多不主張計劃經濟，而且以為社會主義如想「以提高全民生活水準」為目標，必須放棄計劃經濟。我的看法，是與這一些人相同的。

負生先生主張社會主義，必須與計劃經濟相輔而行，其主要的論點有三。第一，他以為沒有計劃經濟，供求就不能澈底地相謀。其實，在計劃經濟之下，計劃者所能勉強控制的是「供」，至于「求」，他是不知道的。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在一年之內，到底是一些什麼，我們自己都回答不出。這個需要，時刻在那兒變動，影響這個變動的要素太多了，收入是其一，物價是其二，嗜好是其三，風俗習尚是其四，還有其他原素不勝枚舉。連消費者本人都沒有法子回答出來的問題，計劃者如何能回答得出？因此，假如他計劃生產皮鞋一千雙，或無線電收音機一百架，這種決

定，必然是武斷的，決沒有由價格機構中所表現出來的需要那樣的客觀。在價格機構之下的生產，供求失調是不可避免的，這就需要隨時調節。調節得當，失業是可以避免的。在社會主義之下，失業的避免，尤為容易，因為社會主義的政府，可以隨時創造新業，來安插那些失業的人。

其次，負生先生以為社會主義的生產，是為大眾的，我很同意；但他說以大眾用途來決定的社會主義生產，只有在計劃經濟之下可以達到，則我不能同意。私有財產下貧富不均的現象，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有一部份受少數有能力購買的人們的用途所決定，因而產生奢侈的浪費，那是有目共睹的。但在社會主義之下，大家都只有勞動的所得，而沒有財產的所得，貧富不均的現象，自然要改善許多。這種改善情況之所以造成，并非由於計劃經濟，而是由於私有財產的廢除，這一點我們非弄清楚不可。在社會主義之下，貧富不均的現象，雖然改善了，但并不能取消。斯大林曾說過：「如果由此作出結論，說社會主義要把社會組成員們底需要都平均，劃一和均等起來，要求把他們的胃口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均等起來，說按馬克斯主義者底計劃，大家都應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和同等的飲食，那就是胡說八道。」所以在社會主義之下，收入還是有差等的，因而消費也有差等，不過這種差別不如資本主義中那樣顯著就是了。他們既然不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飲食，那麼他們所穿的，所吃的，應該是由誰決定，方合于他們的需要呢？是由他們自己決定呢，還是由第三者代為決定呢？我想假如我們真是顧到大眾的幸福，那麼這種決定，最好是留給大眾。否則大眾要吃麵，而計劃者供給米（沒有麵時，大眾也只好吃米）；或者大眾需要一百斤米，而計劃者只供給八十斤（大眾對於不足的二十斤，只好以別種食物來補充），那只能使大眾感到生活不舒服，不滿足。

第三，負生先生說生產事業私有而無計劃，還是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這一個名詞，介紹到我們這個辯論裏來，是很好的。自由主義應用在經濟的領域裏，就是消費者選擇的自由，以及勞動者就業的自由。我可以引負生先生的話說：生產事業私有而有計劃，是極權主義的經濟；生產事業公有而無計劃，是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我是贊成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因為在這種經濟之下，階級的現象取消了，貧富不均的情形改善了，奢侈與失業的對立不存在了，同時還維持着消費者選擇的自由，與勞動者就業的自由。我們應當擇善而從，所以我們要社會主義，但不要計劃經濟。



專論

改革幣制法案的檢討

劉大中

醞釀已久的穩定金融改革幣制緊急命令，終於八月廿日公佈出來了。這一次的改革，雖然不夠徹底，不夠圓滿，但政府總算是拿出來了一個辦法。這一套法案，問世不到兩日，我們還沒有詳盡研討的機會；但是事關重要，我們願意先把初步意見提出，供大家參考。

本文共分三節。第一節是改革法案的扼要敘述。在第二節中，我們把有關這個法案成敗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指出；政府對一般人民的最低生活負有保障的責任，對於這個關鍵，有義務使其立即鞏固。最後在第三節中，我們把這個法案的其他缺憾，約略的討論一下。

第一節：改革辦法的內容。

此次的經濟改革辦法，共分金圓券發行辦法、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國內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和管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四種。我們現在把各項辦法，扼要敘述如下：

(甲) 金圓券發行辦法：

(一) 我國以後的貨幣，改以金圓為單位，每圓的含金量定為〇·二二二一七公分（恰為美金一元含金量的四分之一）。但是這不過是法律上的一個定義，實際上政府並不鑄發金圓；在市

面上流行的，主要的仍將是紙幣，取名：「金圓券」。人民並不能持這種紙幣向政府要求兌換黃金，也不能自由購買外匯。所以我們所採用的本位制度，並不是正統的金本位，也不是金匯兌本位，實際上仍是紙本位，是一種用黃金來下定義的紙本位。

(二) 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人民可將現行法幣調換金圓券，兌換率是三百萬元法幣對一金圓券。在該日前，法幣仍准按這個兌換率在市面流行。

(三) 金圓券的發行，採所謂「十足準備制」，即每發一元的金圓券，政府手中即須有價值一元的資產作準備。在這種準備中，百分之四十定為金、銀、外匯，其餘是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的國有事業資產。這一條最無聊，我們在第一節中討論。

(四) 金圓券發行總額以二十億元為限。組織「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每月審核發行和準備數額，並公告全國。凡發行數超過準備值時，中央銀行即須收回發行，或增加準備。

(乙) 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

(一) 金、銀、銀幣、和外幣，從此禁止流

通、買賣或持有。持有人必須在九月卅日以前，兌換金圓券；黃金按每純兩二百金圓，白銀按每純兩三圓，銀幣按每元二元，美鈔按每元四元兌換。

(二) 除去兌換金圓券外，持有人還可以用所有的金、銀、銀幣、和外幣去購買三十六年美金公債；或存儲在中央銀行，然後憑輸入許可證，支付輸入物品的貨價，或支付經財政部核准的其他用途。

(三) 金、銀、銀幣、外幣禁止出口；攜帶進口時，也應按上條規定，兌換金圓券（少數例外規定，無關重要）。

(丙) 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辦法：

(一) 人民應將截至卅七年八月廿日止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包括活定期存款、金、外幣、證券、股票、債券、地契、及一切流通票據和支付權益等），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向中央銀行申報登記。以後獲得的外匯資產，也須在獲得後兩個月內申報。

(二) 凡申報登記的外匯資產，其存款、外幣、及資產之權益或變賣所得的部份，均應移存中央銀行（少數例外規定，無關重要），但可為

下列目的支用：一、經財政部核准的正當用途；二、憑輸入許可證支付輸入貨款；三、兌換金圓券；四、購買卅六年美金公債，或政府將來發行之金圓公債。

(丁)管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

(一)稅率、和國營公用及交通事業之收費，准參照戰前標準調整。

(二)剩餘物資及接收敵偽資產，儘量加速出售，增加國庫收入。

(三)繼續統制外匯，有正當用途者，由政府核准結售。

(四)輸入繼續採用限額統制；輸出所得外匯全部售與中央銀行。

(五)匯率定為每元美金折合金圓四元。

(六)各地物價，照八月十九日價格，依兌換率折合金圓出售，嚴格取締違反漲價限價規定。

(七)實行倉庫檢查，登記其進出貨品，取締囤積居奇。

(八)公教人員的待遇，以金圓券支給。在京滬區的，月薪在四十元以內者實發，四十元至三百元部份支十分之二，三百元以上部份支十分之一。其他區域按七月份與京滬區的比例調整。

(九)民營事業員工薪資，一律按八月份上半年標準，折合金圓券發給。

(十)國家行局不得作商業性質的放款；對於奉行國策的貸款，應負考核資金運用和成效之責。

(十一)商業行莊應恪守法令，不得繼續經營物品購銷業務；並限令於兩個月內，增加資本至政府規定之最低額，其現金增資部份，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

(十二)市場利率應予抑低；各地匯水應予

調整。

第二節：成敗的關鍵。

這次發行的金圓券，既仍是不兌現的紙幣，那與以前的法幣（與發行三百萬元票面的法幣大鈔）又有什麼分別呢？

究竟是否有分別，要看政府是否有能力實踐「金圓券發行總額以二十億圓為限」的諾言。這個諾言之能否實踐，又須看以後政府財政收支的情形，是否能像財政部長王雲五氏所說的那樣樂觀。

王雲五氏在十九日發表的談話中說：「：今後總算出預算如能力從樽節，控制得宜，每年實際支出當可減至九億美元之等值，即金圓三十六億圓。至於歲入方面，：估計關稅全年收入為金圓四億八千萬圓，貨物稅七億圓，直接稅三億六千萬圓，鹽稅三億二千萬元，其他各稅連同國營事業盈餘稅收入等共二億元，出售剩餘物資敵偽產業等約四億元，以上收入共金圓二十四億六千萬圓，收支相抵，所短之數為十一億四千萬元，約當總歲出百分之三十弱，擬運用美援以抵補其一部份，其尚不足之數，當發行金圓公債，以資彌補」。

關於支出和稅收的估計，王雲五氏應有其根據，如果相當精確的話，赤字支出不過十一億元強；而此次美貸中可由政府出售的物資價值即應在一億五美元左右，約合六億金圓，以此抵補後，所餘赤字支出不過五億金圓左右。五億金圓的赤字支出，想要完全用非膨脹性的公債（由人民直接募來的公債，而不是透過銀行系統放出去的公債）來抵補，事實上也不容易，但是這赤字數量究竟並不太大，物價應可小康局面。問題是：赤字支出真會這樣的小麼？我們的答案是：赤字支出是否真能這樣小，除去看軍事局面以

外，完全要看最近兩三個月內的物價，是否能有一暫時的穩定。

王雲五氏對於政府支出的估計，自然是按現時的物價算的。假如目前物價繼續上漲的話，支出的數值自然會比例增多。根據過去的經驗，稅收的調整是相當費時間的事，所以在稅收能如預期增加以前，金圓券的發行只有陸續增加，二十億的限度很快的就可以達到。達到以後，政府除非關門，否則如要繼續執行行政的話，金圓券只可繼續發行，在現實的世界中，是沒有什麼魔術手段可以用的，二十億限度的諾言，將必不能實踐。所以現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物價是否有一個暫時穩定的局面呢？

物價是否能有一個暫時穩定的局面，事實上完全要看政府自己怎麼去作。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分析一下。在最近一個月中（甚或兩個月中），政府的稅收還是無法能有大量的調整和增加的。稅率的折算公佈，商人們的拖延，和稽征的手續，都是費時的。在這個期內，政府仍將依靠發行金圓券來應付支出，情形和以前沒有什麼分別，所有以前存在的膨脹因素，繼續存在，物價仍有繼續上漲的趨勢；所差的只是新幣發行對於人民（特別是商人）心理上可能有之穩定作用而已。但是商人是聰明不過的，假如金圓券按以前的速率增發，這種心理上的穩定作用，很快的就會消逝的。所以在這一兩個月內，政府必須採用特殊的方法，去抑制物價，直到稅收的調整發生效用以後，再作通盤的長久計劃。

政府能用什麼特殊方法在這一兩個月內去抑制物價呢？是「請假」嗎？是「限價」嗎？這種百試不靈只用冰枕而不用消炎藥的退熱方法，顯然是可行而無大用處的。我們只要用一點最淺近的經濟學原理，就可以知道這特殊的方法是什

麼。物價的上漲，是法幣數量、法幣流通速率、銀錢業信用款項、和銀錢業信用款項的流通速率四項因素增加的總結果。方才已經說過，在這一兩個月內，政府是沒有方法能減少金圓券的增發的。所以第一個上漲因素無法取消。金圓券和舊法幣的流通速率是操在一般人民的手中的，政府亦無有效的方法可以控制。第二個上漲因素，也無法應付。剩下的就只有銀錢業的信用款項和它流通的速率了。

爲求暫時的物價穩定，政府應立即封凍行莊（國有和私有的）存款，停止行莊放款（例外的放款，我們在此不能詳論，容另爲文解釋），使銀錢業信用款項的作用，差不多完全消逝，用以抵消金元券增發的惡影響，直到稅收的調整和增加達到預期的數量時，再作通盤的籌劃。

銀錢業在我國是一個極大的威權集團，封凍存款和停止放款對於他們自然是一種損失，縱然政府肯這樣去做，他們也必會盡力反對。在這次改革幣制方案發表以前，我們也曾聽到政府將對銀錢業取斷然處置的傳說，但是就已經公佈的方案來看，除了限期增資和一些作文章式的規定以後，並沒有大刀闊斧的斷然處置，足見金融勢力的偉大，和政府的畏縮。但是政府實際上已到了作一決定的最後關頭：它必須要決定，內戰的費用究竟還是用賦稅的方法取之於有錢的人，還是用通貨膨脹的方式取之於一般民衆。它若決定用前一種方法，此次的幣制改革必須成功；換言之，按我們以上的分析，在稅收未能如期調整、新幣增發無法減低之前，政府必須封凍銀錢業存款和停止放款（例外情形，另文討論）。它假如還是不敢向銀錢業採用大刀闊斧的手段，則這一次幣制改革必失敗，現政府的命運也就從此絕定了。

第三節：其他的批評

我們對於此次改革方案的主要批評和建議，已如上述。此外，這次改革還有幾點次要的缺憾，分述如後：

（一）在「金圓券發行辦法」原文和王雲五氏的談話中，政府特別強調這一次新幣發行準備金的充足，說什麼「每一金圓券都有十足準備」。國民黨在各地所辦報紙，也是在加重宣傳這一點。例如，北平華北日報二十二日的社評說：「新幣制的優點甚多。第一爲確定含金量而準備充足。新幣二十億元之準備金，包括二億美元金銀外匯三億美元可靠物資。發行辦法第八條並明定採用十足準備制，較世界各國銀行發行基金三分之一或十分之四之慣例，可謂異常充分。且與金銀外匯發生聯繫，可互相制約，而收抑低物價穩定信用之效。」這全是自欺欺人之談。這些「金銀外匯」和「可靠物資」，政府在未發行金元之前早就都有，何以法幣會貶值到如此可憐地步。在不兌現的紙幣制度和外匯受強硬統受之下，準備金的多少與幣值的高低，可以說是風馬牛全不相干，政府又何必拿這種十九世紀的經濟學來欺騙人民？在發行新幣正需取信於民的時候，政府益採用這種欺騙式的說法，是極不聰明的舉。讀者可參閱本刊第一期「準備金多了有什麼用？」一文。

（二）「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僅命人民將截至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止之外匯資產呈報。按各國先例，這個日期總是在命令頒佈的幾個月以前的一天，在這期內的外匯資產數量，如有變更，告報人應解釋用途。這樣可以使事前聞風變賣逃脫的人，自費精力（我們應注意，封凍外匯資產的事已經鬧得很久了），政府並未注意這一點。

（三）辦不到的事，如果隨便發道命令說是要辦，而結果依然是辦不到，政府的威信沒有不減落的。政府過去這種經驗非常豐富，但始終未明白這個教訓。這一次又要禁止人民存有金、銀、銀幣、和外匯資產了；和何有效執行呢？我們從條例上既看不出，從經驗中也不想出來。假如外商銀行和企業，我國自己的豪門和巨吏並不交出多少，而小民手中的幾塊現大洋則必須交出，去換那前途尚無把握的金圓券，這如何能算公平？最好的鼓勵人民守法的辦法，莫如由政府先催上面所說的特殊階級先繳，然後把他們所交的數目公佈出來，以取信於人民。人民看見這種成績以後，自然也就肯「合作」了。

（四）另外一件辦不到的事，是勒令各地物價照八月十九日價格依兌換率折算。政府有什麼把握覺得它能確實執行這條命令；若是不能執行，豈不是對這次改革條例的威信立予打擊。事實上，這兩天的價格，有漲有落，已經不是十九日的價格了。同時在稅率，及國營公用和交通企業依照命令「參照戰前標準調整」以後，其他物價如何能不變動，爲什麼不應變動？

（五）月俸四十元的小書記的新水，「按八月十九日的價格折算」，不過買上四袋多麵。假如他不自度力量而娶妻生子，兩三個兒女又都不能享受憲法上的權利免費入小學，叫他如何應付這一家的最低生活和教育需要？是不是鼓勵他去作弊？假如他官卑職小作不着幣又富如何？他的「公館開支」是不是也能和他的長官一樣向衙門報銷？

（六）最後一點，也是最小的一點。爲什麼「外匯資產」的持有人將來可以購買「金元公債」（外匯資產登記辦法第十條），而「金銀外幣」的持有人則不能呢（金銀外幣處理辦法第四條）？

八月二十一日於清華園

通訊

從莫千山到牯嶺

(南京通訊)

本報特約記者

牯嶺之秋

經濟問題已到山窮水盡之秋，由牯嶺看中國，山上的繁華與山下的貧窮形成了強烈的對照。

據美聯社牯嶺五日電稱：「長江有些地段，在眼界所及的地方像是一個大湖，有些地方河堤突出，好像黃海中的島嶼，向長江上流航行已漸變危險，因為許多航行標誌都被沖走，常常難定河岸是在那裏，據未證實的報導，有許多航線已停止航行，但是民船仍停泊在九江的江邊。」

在四千尺高的牯嶺下望九江周圍的泛濫區，找不出河道來，牯嶺山上仍然有各種活動，許多上海外國僑民到這兒消夏，對於一個外國人，牯嶺是一個顯明的對照。山嶺的草原松林和清泉與山下的貧窮和飢饉正為一個強烈的對比。所有牯嶺的必需品都是用轎子抬上去的，轎子也是國人上山的惟一代步工具。

「牯嶺注視着洪水，好像它注視戰爭中破壞的中國一樣，一切歸罪於命運，當住在牯嶺的人想回上海而被洪水所阻，或是沒有飛機可乘的時候，他們也不免會想到中國的悲慘命運。」

美聯社記者又指出華中大水影響到牯嶺的線路，都受威脅了，他說：

「長江水位高漲可能切斷這個高山上的夏都的一切交通。但到了緊急時候，九江新建的飛機場仍可用作空中的聯繫，目前到牯嶺還沒有空運，南京沒有批准這個飛機場可供商用，理由也沒有宣布。」

「僅有的二條通牯嶺的交通線——河運與鐵路已在受着泛濫的影響，二星期前

南潯線的鐵路由於洪水而開始折斷，有些地方立刻修好，有些地方利用着渡船。

「上帝」的福音，也許長江不會重演二十年的苦難，但今年的氣候却因為在水的包圍中一定比往年更為涼爽。牯嶺雖然沒有架成如去年所宣傳的高空電車，但是二切設備並不減當年。蔣總統也拖到了立秋之後，於九日才偕夫人登山觀秋，美大使司徒雷登於十三日才飛往牯嶺，據說一重溫去年在牯嶺一週國畫的舊夢。此時此地與馬歇爾八上廬山時已大大不同。

莫千山在上月二十九日以前的舊冠蓋想必又是在秋蟲唧唧聲中，再上廬山了，這一次忙些什麼，且先回叙上次的舊話。

「莫千山」小記

十天以前蔣總統忽到莫千山住了四天，亂烘烘的全部棋局上是一個意外的走動，七月二十六日，蔣氏忽然決定上山，過杭州不停，到達山腳下的康村，已到了午七時半，便坐着仿廬山造的竹轎及牯嶺訓練出來的轎夫飛登屋脊頭五五〇號，那是上海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陳永青的別墅，在二千尺高地的松林中，全部歐式設備，住在那裏簡直是一個清淨所在，觀看山色正是：

「請潤好花如靜女，數峯奇石如飛仙。」

忙裏偷閒的人，住了下去，則有如：「靜坐却嫌流水鬧，閒眺翻怪白雲忙。」

星島日報所刊那時的匆忙道：「總統夫婦在下午八時許，始到達山上，杭州市長周象賢和蔣經國陪侍上山，因為時間太晚，所以連周市長慣用的吸煙打火機，也沒有帶來及送上山來。」

莫千山有千將莫那煉劍的殺氣，足以

振作精神，雖然離杭州不遠，仍然是荒村模樣，一山上原有電燈，對日抗戰時搬走了，至今還沒有裝起來，所以總統官邸中裝的是汽油燈，總統嫌略有煤氣，改為用蠟燭代光，山中遠近居民，天天在各處名勝迎接。

「最爲荒村特色的就是外國男女的服裝，」女的大半短褲帶着乳罩，男的多半短褲，有領的汗衫，他們見了總統都立正致敬，「外國朋友這種禮貌也是古之無，今之少有，」滿山的蟬鼓着他的翅，努力在叫知了知了，夾着琤琮流水，正交織一曲，美麗的音樂。」這也是一種單調的音樂。這裏一客蛋炒飯八十萬，雇車代步百萬元，住一間房過千萬元，「總統在山邊的馬路上散步，他頻頻地招呼我們道：「來玩的嗎，玩得好玩嗎？」

從蔣總統下山以後的行動：(一)召集軍事教育會議，(二)舉行黨務革新座談會，(三)洽商新借款改革幣制，並研討經濟改革方案配合美援物資。好像是在一和論一之風過去後的一切實一措施，先有了一套設計，然後始能見諸行動。如何以自一己的一變一配合萬方的一變一。

國際上也是一個萬花筒，和我們沒有多少相關的有瓊河會議，太近的有東南亞英殖民地會議，與世界步驟相關的則是柏林會議與莫斯科會議。在純粹中國式的山村中，靜觀原子時代的萬花筒，功利者又純然是道家傳統。

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而經濟又是軍事的延長，外觀上所能表現出來的，是經濟金融當局的僕僕莫千山。莫干，莫干，到最後才知那些猜測都不相干。新經濟方案並未圖窮七現，這是怎麼一回事？

山雨未來

翁文瀾內閣是所謂美援內閣，是經濟內閣，應當是有把握與通貨膨脹的洪流來鬥法的內閣，這內閣對經濟方面有什麼表

現呢？

「當一些閣員都在僕僕風塵的時候，翁閣的一位名爲許世英老閣員却拿了蔣總統特贈的三千港幣到了香港，這是在一避暑一聲中，僅有的一個「例外」，因爲誰都知道這位七四翁在政治上是一個全木面香港却又是一個不宜於避暑的「是非之地」，他到港雖然避見賓客，但在報紙上仍然露出他在提東說西，譬如他說：孫科應當休息了，繼任人選最好是吳鐵城，他自己這次到香港，除避暑外，決無他事。」

對於翁內閣，他却是作絕望的指摘。

他說：

「翁院長的三大法寶都拿出來了，一是大量拋售物資，收回法幣；二是抽緊銀行裏的銀根頭寸，減少法幣流通率；三是指揮軍警掃蕩黑市，杜絕奸商操縱，使法幣不爲囤積居奇的人利用，對付法幣，翁院長的法寶也只止於此了，我想，他也沒有其他新法寶出現了。」

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就是屈指可數的那幾位，無不與外力有關，孔祥熙，宋子文，最後的是張羣。當翁文瀾這個「不似」的內閣有些推不動這大皮球時，有人便以爲「西南王」宋子文是蔣總統準備好久的「一個棋子」，很可能把他搬回來，使美援內閣當真名副其實，「自力」一說不能「更生」，索性作買辦到底，也可得山錢叔的歡心，於是翁閣又有不穩的消息。

蔣總統返京了，宋子文返京重掌政治的聲浪也很高，甚至宋來祖國的條件如何如何也有些政客們在猜測，可是看了這樣一個新聞之後，便知道宋在香港的一段時間，似乎除了經濟性的活動外，還有政治性活動。

「宋子文在最近來港期內訪過李濟幾次，這是李自己說的。他說宋子文訪他是爲商量一有關廣東治安問題」，而他則勸宋子文作一個新的革命，依照三民主

小姐一選季之類，康健「小姐」比賽大會，在前些時第七屆全運時，出盡風頭的香港游泳女選手黃綺貞，所謂「新美人魚」，來市表演時，就吸引了整個市面，萬人空巷來爭看這位「新美人魚」的丰采，連受總統召見，在中央週刊作封面的「英雄人物」王鳳崗，被宋主席邀請來穗時情景，也為之黯然失色，泳場周圍的如魚算盤，是不會放過這個賺錢的好機會。



紀念朱自清先生

在政府軍事，政治，經濟都筋疲力竭的時候，有一些人正預期着這塊「革命」的鄉土，會有奇蹟出現，發出像一九二六

年北伐時代的光輝，但時代是永遠前進的，歷史決不會再重演，一個政策的革命成功，只決定於他革命路線，與革命對象，能否適於大眾人民所需要，而不是什麼「王牌」與奇蹟。

楊振聲

一 我在八月十二日下午五時以後才接到朱佩弦先生當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逝世的噩耗。那天晚上便有人找來要寫紀念朱先生的文章，並且說明日上午就來取稿。我當時拒絕了。一位你所敬愛的朋友剛死，悲憤佔領了整個的心境，那里提得起筆來寫文章，現在去朱先生的忌日已經過去了，中國舊俗叫作「七七」，悲憤似乎沉下去一點，想起往日共事時，他的品德的可愛，記下一二小事來。我們對朋友的認識，那怕過從甚久，總不過風之一毛，麟之一角。但把這些零星材料搜集起來，將來有朋友——我相信一定會有——替他作傳時，或許會有點用處。

那受氣的國文系中作小媳婦！我去清華的第二天，便到古月堂去訪他。他住在西廂房一間小屋裏。下午西窗的太陽，射在他整整齊齊的書桌上，他伏在桌上低着頭改卷子。就在這小屋裏，我們商定了國文系的計劃。

先生雖死，而遺志還生長着，人生才不是短促的，思想也不是暴力與頑固所能摧毀的。

我們國文系共事的時候，前後約共十年（先在清華，後在西南聯大），每一事件的經過，都加緊我對佩弦先生的敬愛。有一次他忽然要辭職，我吃了一大驚。問他原因，他說他把一個學生的分數算錯了。我說：「假使我們教一輩子書，只算錯一次，雖不可原諒，倒可饒恕。一這只體面。他是怎樣地負責！怎末說我也對你不要辭職。國文系可以沒有我，但不能沒有他。他是太知道愛惜青年了。他對同人虛懷，對學生一樣也虛懷。他從不挑剔旁人的短處，却老想着旁人的長處。他從不固執自己的意見，正相反，他從善如流，有時甚至放棄了自己更善的意見，就為那是自己的。因為他能夠不拘拘于自我，所以他才能放大自我。他時刻在吸取，在綜合，一切新的印象，新的思想。一句話，他無時不在發展與更新中。也因此，他對於青年的思想不隔膜。他了解了，能同情，如此也才能領導。我們在這變動的大時代中，先生與學生的思想脫節，父兄與子弟的思想脫節，因而到處都是衝突與矛盾，這才真是我們時代的悲哀。能在這時代中吐故納新，勿勿勿我的人，才能作這新舊文化交接的一環。朱先生便是一個，而他又偏偏早世了！

二 那是將近二十年以前的事了。民國十七年秋天，清華已正式改為大學，我擔任了國文系主任。那時清華的風氣與現在大不相同，國文是最不時髦的一系，也是最受壓迫的一系。教國文的是滿清科舉出身的老先生們，與洋裝革履的英文系相比，大有法幣與美鈔之別。真的，國文教員的待遇不及他系教員的一半。因之一切都貶了值，買書分不到錢，行政說不上話，國文教員在旁人眼裏視錢下，走邊路，住小房子。我想把國文系提高，使與他系一律平等，那第一得物色人材。

新文學的國文系中作小媳婦！我去清華的第二天，便到古月堂去訪他。他住在西廂房一間小屋裏。下午西窗的太陽，射在他整整齊齊的書桌上，他伏在桌上低着頭改卷子。就在這小屋裏，我們商定了國文系的計劃。

四 我與佩弦先生雖是北大前後同學，但前此僅是文字之交。我到清華時，他就在那裏。

我與佩弦先生雖是北大前後同學，但前此僅是文字之交。我到清華時，他就在那裏。

過只是中庸之至。這里也正是他文章的作風。他雖然也以詩名，但他並不是詩人（聞一多先生才是到底的詩人），他是從頭到腳的一位散文家，就只爲了他的中庸，他的散文才真真作到溫柔敦厚。這是性情的分別，並不是詩與散文的分別。他論人論事，這字這字，到處是那末恰當，那末正常，那末入情入理，他的文章沒有驚天動地的，也沒有駭人聽心的。沒有驚天動地的，也沒有駭人聽心的。有的只是溫和，有的只是幽默，有的只是冷嘲。與他的爲人一樣，一切是平正，是溫厚，是情理得中，一句話，中庸之至。

不毀滅的

背影

在他不斷的擴展中，他近來又注重北平口語的應用。不，他一向就注重口語的。不過，他近幾年的文章更就注重口語。許多詞句都那末活生生地在紙上跳躍。這真又引起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能不能完全用一種方言，譬如北平話，寫文章？佩弦先生的答案又是那末中庸；他主張我們以北平話打底子，再補充以普通的語言與學術上的詞彙。自新文學運動以來，我們是以口語入文了，可是我們都缺乏在口語方面的訓練與研究。我們大部用的是藍青官話，已經是不北不南了，再加上些不中不西，不文不白的改造，聽起來真有點像文明戲的台詞；這種語言組織成的文字，

無疑地可以通行南北，雅俗共賞，可是它缺少一件東西，那便是語言的靈魂！我們爲紀念朱先生，這方面就需要更大的努力。

自抗戰以來，尤其復員後，薪水階級待遇的不合理，把社會中守法安分的，良善負責的成份，都以漸的毀滅或正在毀滅中，代之而起的是一班人！佩弦先生之死，不能容受的一班人！佩弦先生之死，不能死於病而死於窮。自在昆明時，他就飢一頓飽一頓的弄出胃病來，胃病是個勢利病，在富人只要少吃多休息就行了。在窮人可不行，第一他吃不多，第二他休息不給，在窮人可不行，第一他吃不多，第二他休息不給，不但休息不給，

他還得於教書外，寫文章，編輯什末的。不如此養活不了一家。一食少事煩，其能久乎！——這正是朱先生的病案！在最後入院前，他還說，可以不用入醫院，他忍受慣了。他只是捨不得那筆醫藥費！我曾經有一次對他開玩笑的說：「你自少便作好兒子，結婚後作好丈夫，生子後作好父親，教書作好先生，對人作好朋友，對國家作好國民，你自己那裏去了？」他就是爲了這個「好」字，把他自己完全犧牲了！

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北平

沈從文

「其爲人也，溫美如玉，外瀟而內貞。」

舊人稱讚「君子」的話，用來形容一個現代人，或不免稍稍迂腐。因爲現代是個粗獷，奢侈、褻私、瘋狂、的時代。藝術和人生，都必象徵時代失去平衡的顛倒，方能吸引觀聽。「君子」在這個時代雖稀有難得，也就像是不切現實。惟把這幾句作爲佩弦先生身後的題詞，或許比起別的稱讚更恰當具體。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愛可敬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誠誠中有誠，外瀟而內貞，這種人格或性情的混和，在作人方面比文章還重要。經傳中稱的聖賢，應當是個什麼樣子，話很難說。但歷史中所稱許的純粹君子，佩弦先生爲人實已十分相近。

者反應，都覺得是新詩空前的力作，文學研究會同人也都推許備至。惟從現代散文發展全局，佩弦先生的敘事散文，能守住文學革命原則，文學明朗、素樸、親切、且能把握住當時社會問題一面，貢獻特別大，影響特別深。從民九起，國家教育設計，即已承認中小學國文讀本，必用現代語文作品。因此梁任公、陳獨秀、胡適之、朱經農、陶孟和……諸先生在理論問題文中，佔了教科書重要部門。然對於生命在發展成長的青年學生，情感方面的啓發與教育，意義最深刻的，却應數冰心女士的散文，葉聖陶魯迅先生的小說，丁西林的戲劇，和佩弦先生的敘事抒情散文與人生信札，和佩弦先生的敘事抒情散文與在文學運動理論上，近二十年來有不斷的修正，語不難宗，一普及和一通俗一目標實屬問題核心。真能理解問題的重要性質，又能把握題目，從作品上加以試驗，證實，且得到持久性成就的，少數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類拔萃。

我認識佩弦先生本人時間較晚，還是民十九以後事。直到民二十三，才同在一個組織裏編輯中小學教科書，隔二三天有機會在一處商量文字，斟酌取捨。又同爲一副刊一月刊編委，每二星期可集會一次，直到抗戰爲止。西南聯大時代，雖同在一系八年，因家在鄉下，除每星期上課有二三次碰頭，反而不易見面。有關共事

同處的愉快印象，照我私意說來，潘光旦、馮芝生、楊今吾、戴平伯四先生，必能有紀念文章寫得更親切感人。四位的叙述，都可作佩弦先生傳記重要參考資料。我能說的印象，却將用本文起十餘字概括。

一個寫小說的人，對人特別看重性格。外表輪廓線條與人不問處何在，并不重要。最可貴的是品性的本質，與心智的愛惡取捨方式。我覺得佩弦先生性格最特別處，是拙誠中的敏，即調和那點「外瀟而內貞」形成的趣味和愛好。他對事，對人，對文章，都有他自己意見，見得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別可能極小。他也有些小小弱點，即調和折衷性，用到文學方面時，比如我用到藝術批評方面，便永遠具教學上的見解，少獨具肯定性。用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專斷議論，無創見創獲。即用到文學寫作，作風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風格上，三十年少變化，少新意。但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學教育有關。在清華、聯大、一委員到一習慣下任事太久，對所主持的一部門事務，必調和折衷方能進行，因之對個人工作爲損失，對公家貢獻就更多。熱人記憶中如尚記得聯大時代常有人因同開一課，各不相下，便持如擺擺台局面，就必然會

我認識佩弦先生和許多朋友一樣，從讀他的作品而起。先是讀他的抒情長詩「毀滅」，其次讀敘事散文「背影」。隨即因教現代文學，有機會作個進一步的讀者。在詩歌散文方面，得把他的作品和魯平伯先生成就并提，作爲比較討論，使我明白代表五四初期兩個北方作家：平伯先生如代表才華，佩弦先生實代表至性，在當時爲同輩有情感且善於處理表現情感。記得「毀滅」在小說月報發表時，一般讀

性，又能把握題目，從作品上加以試驗，證實，且得到持久性成就的，少數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類拔萃。

我認識佩弦先生本人時間較晚，還是民十九以後事。直到民二十三，才同在一個組織裏編輯中小學教科書，隔二三天有機會在一處商量文字，斟酌取捨。又同爲一副刊一月刊編委，每二星期可集會一次，直到抗戰爲止。西南聯大時代，雖同在一系八年，因家在鄉下，除每星期上課有二三次碰頭，反而不易見面。有關共事

同處的愉快印象，照我私意說來，潘光旦、馮芝生、楊今吾、戴平伯四先生，必能有紀念文章寫得更親切感人。四位的叙述，都可作佩弦先生傳記重要參考資料。我能說的印象，却將用本文起十餘字概括。

